



乔力 / 主编
中国古代文学主流

许
总
著

宋 诗

以新变再造辉煌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宋诗: 以新变再造辉煌 / 许总著.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12

(中国古代文学主流 / 乔力主编)

ISBN 7-5633-2943-9

I. 宋… II. 许… III. 诗歌-文学研究-中国-宋代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1215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36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电子信箱: pressz@public.glptt.gx.cn)

出版人: 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核工业中南 310 印刷厂印刷

(广西兴安县 2310 信箱 邮政编码 541307)

开本: 850 mm × 1 168 mm 1/32

印张: 9.875 字数: 226 千字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 ~ 3 000 定价 1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序

乔力

在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发展历史中,无数优秀作家及作品,犹如满天星月映辉,绚丽夺目。就其整体发展态势而言,其呈现为不均衡的、流动变化着的一种过程,即在不同历史阶段里,各类文体兴衰更替。有些或已臻辉煌顶峰,从而成为具经典艺术价值的范型,被视作某个特定时代的文学主流。正是这些交替出现的主流,引导、制约着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中国文学长河的走向。

对于这种具有历史规律性的重大创作现象,古代文论家们早已有所认识,如晚明袁宏道、焦循等。至本世纪初,王国维承旧说再更益以新时代的通达眼光与宏阔气度,正面提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理论,称扬:“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宋元戏曲

史·自序》)要言精语,蕴积了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美学意义,为学界普遍认同,遂成共识。

“中国古代文学主流”书系,基于上述观念,依明晰的“史”的脉络,采取断代置点、连线成片而总合为一的结构方式,由之勾画出贯通上下、包罗万象的中国文学大厦的整体框架。它按文体分别,参照相应的时代文化环境,选择能够代表其最高成就、充分显示审美特征,或者标志重要演进阶段的有关断面,作为论述对象。具体说来,有以下诸方面:

——首先是诗歌类。这里是广义的概念,包括词和散曲在内,并附及诗论。共计7种,即《先秦诗:真与奇的耦合》、《汉魏六朝诗:走向顶峰之路》、《唐诗:日丽中天》、《宋诗:以新变再造辉煌》、《唐宋词:本体意识的高扬与深化》、《元明散曲:大俗之美的张扬与泛化》、《诗论:审美感悟与理性把握的融合》。

——其次则为赋类。大致而论,赋是游移于韵文和散文之间、骈散兼行的非常特殊的文学样式,有《赋:时代投影与体制演变》1种。

——复次便是散文类。散文是历史最悠远、最具变异性,而体式也最为庞杂开放,除却韵文之外几乎无所不容的一种文学样式。共计有4种,约略体现出它由实用到审美、自杂散文向纯文学散文演进的轨迹,即《先秦诸子散文:诗化的哲理》、《史传文学:文与史交融的时代画卷》、《唐宋散文:建构范型》、《明清小品:个性天趣的显现》。

——再次为戏曲文学类。有一种，即《戏曲文学：语言托起的综合艺术》。

——最后是小说类。它的源头虽然可以追溯到上古，但发展却十分缓慢，而一旦进入文体成熟阶段，又很快形成高潮。共计有2种，即《文言小说：文士的释怀与写心》、《白话小说：从群体流传到作家创造的社会图卷》。

总之，考察诗歌（包括词、散曲在内的广义概念和诗论）、赋、散文、戏曲文学、小说共计5大类，含有15种专著的结构形式，可见出本书系固然某种程度上也有着文学史性质——如颇注重文学的分体断代——但它实质上，却迥异于以往文学史那种根据时间顺序，全盘罗列一切文学样式的各种创作现象；或者按照成例，先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背景之类，再进而论析文学本体来推演比附的思维模式。

本书系立足缜密开阔的理论观照和精微细致的审美感受，就“本体论”——“流变论”的上下编二元组合双向审视中，注重时间概念与时代概念在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上的一致，由之确认于大文化视野里，重新对中国古老的文学传统作出现代阐释。同时，依表层势态和深层运动所显现、蕴含的发展演化规律，筛选最能标志文学价值与特征，及相应时代意义的特定文体，阐释贯穿其中的艺术精神，及其同哲学、宗教、社会心理等相互间的作用影响，换言之，是力求展示中国文学中仍然保持生命活力的那部分性质，并试图发掘出它之所以超越已

经被历史尘土埋没的另一部分的原因所在。

我们的这一书系所设置的结构框架,除却本文开头已阐明的那部分理由外,还有下面的一些考虑:

一是这种兼取时代与文体的主流观念,以其客观、简赅、谨严、实证而获得文学自身运行发展规律的把握和创作业绩的肯定。它显然更便于系统疏理源远流长、纷繁复杂的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主导线索。

再是这种已相当成熟、具有高度稳定性的提纲挈领式的论断,经过了漫长时间的检验,被文学、文化界,以及整个社会所普遍认同。相应地,它也方便我们的实际运作——从总体框架、局部结构的拟定直到具体的细节写作。

现在奉献给读书界朋友的“中国古代文学主流”书系得以面世,首先要感谢学界各位同仁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热情支持。我们遵循事业与友情并进的一贯宗旨,协同完成了本书系。能够为学科建设、学术发展作些贡献,我们由衷地感到高兴!诸多不当处,敬请各位读者、学界通人教正。

1999年初春
于济南玉函山房

前 言

谈论宋诗,离不开对整个诗史乃至文学史发展线索与演变轨迹的了解和清理。纵观中国文学发展史,汉代以前是经学主流时代,文学实为经学之附庸,诗歌的发展亦主要在民间,其文学性既不为人所认识,也无真正的专业诗人,因此,可以称作民间诗时代。随着魏晋时期中国文学自觉意识的确立,诗歌得到空前的大发展,文学从经学附庸中解脱出来,诗歌也由民间走向文坛,毕生从事诗歌创作的诗人出现了,并取得杰出的成就,中国诗史于是进入了文人诗时代。这一趋势到唐代臻于极盛,诗歌既成为唐代文学中的最辉煌部分,同时也无愧为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峰巅。

这就是宋代以前中国诗史之梗概。宋人要在这样的文化积淀与艺术渊源面前进行诗歌创作,其处境可以说是相当尴尬的,正如清人蒋士铨《辨诗》所说“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唐诗的极盛,既是宋人的历史重负,也是宋人的时代机遇。在这样的时代的文化的背景下,宋人自然选择了一条新变之路。同样作

为文人诗时代,宋人完全改变了诗歌的构思方式和功能范围,所谓“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严羽《沧浪诗话·诗辨》),就是对这种新变的最初概括。于是,宋人便在唐诗极盛之后,创立了一种与“唐音”完全不同的“宋调”,构成了中国文人诗的又一范式。

宋诗的新变,其积极意义在于为传统诗歌开辟一条继续发展的新途径,但同时,也无可避免地遭致了传统观念的强烈抨击,这在源自南宋迄于清末的“唐宋诗之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甚至直至今日,唐宋诗的研究者也还未能完全超脱出宗唐祖宋的思维方式的影 响。这就需要我们改变思维定势,从褒贬转为辨异,并建立一种新的艺术价值观念与文学批评准尺。

对唐宋诗的关注,是我多年的研究课题,我在1992年、1994年分别于重庆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有关唐宋诗史的两部专著——《宋诗史》、《唐诗史》(上、下卷),主要是从文学史观念及叙述方式变革的角度,对这两座对比最为鲜明的中国诗史高峰加以阐释与重构。现在,承蒙乔力先生之邀,为“中国古代文学主流”丛书撰写《宋诗:以新变再造辉煌》一种,则进而在史的流变意义之外,试图更着力于对宋诗最本质的文化性格及艺术新变精神加以把握和挖掘。全书按既定体例要求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本体论”在对重铸的宋诗文化性格的宏观把握中努力搜寻其演进迹象,下编“流变论”在对独特的宋诗历史进程的总体重构中努力展示其精神境界,试图通过两编的相辅相成,构织一个立体的宋诗艺术世界。此外,受丛书篇幅的限制,许多问题仅能浅尝辄止,未能充分展开论证,或许还留下了不少疏漏之处,这也是要向读者首先交待的。

许 总

丁丑初秋酷热,于金陵抱一轩

目 录

前 言	1
-----------	---

上编 本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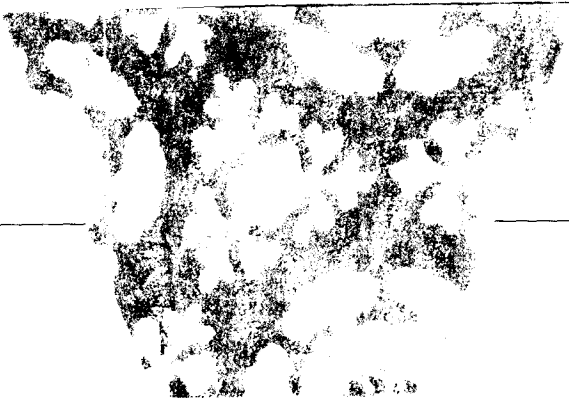
第一章 时代风会中的文化性格重铸	3
第一节 宋代的崇文风气	4
第二节 宋人的心理结构	7
第三节 宋诗的文化性格	11
第二章 政治社会意识与文学价值观	24
第一节 宋代文人的政治地位	25
第二节 宋诗的社会关怀	28
第三节 宋诗的价值观念	38

第三章 理性精神的艺术表征	45
第一节 哲理思辨的渗透	46
第二节 冷静的人生态度	53
第三节 理学思想的诗化	59
第四章 禅悟心态与诗境建构	66
第一节 禅学在宋代的发展	67
第二节 诗、禅渗融的过程与机制	75
第三节 以禅喻诗的观念	81
第四节 心性自足的诗境	86
第五章 以文为诗的发展与新变	97
第一节 思想与艺术的渊源	98
第二节 古文家的创作意识	104
第三节 传统诗歌功能与范围的拓展	112
第六章 宗派意识的确立与强化	122
第一节 从体到派的演进历程	123
第二节 宋诗体派的类型与特征	128
第三节 宋诗派别的争疆别垒	136

下编 流变论

第一章 唐音余韵:宋初三体	145
第一节 白体:浅俗诗风与王禹偁的新追求	146
第二节 晚唐体:清苦诗风与审美意趣的积淀	154
第三节 西昆体:典丽诗风与艺术理想的雅化	161
第二章 宋调建立:诗歌复古运动	168
第一节 儒学复兴思潮与诗学观念新变	169

第二节	欧阳修与宋诗特征的形成	174
第三节	苏、梅诗的异体同构	182
第三章	主体高扬:隆宋诗坛	193
第一节	王安石:政治志向的寓托与山水情怀 的融炼	195
第二节	苏轼:心的升腾与美的超越	202
第三节	黄庭坚:多重整合与宋调规范	211
第四节	陈师道:心灵体验的方式与境界	221
第四章	凝定与趋变:江西诗派	229
第一节	江西派诗风的构成基础	230
第二节	江西派诗人的审美情趣	237
第三节	创作模式的凝定与趋变	244
第五章	中兴与超越:南宋三大家	251
第一节	陆游:军旅豪情与田园逸兴	252
第二节	范成大:雍容气度与温润诗风	261
第三节	杨万里:南宋诗风变革的标志	268
第六章	衰微与蜕变:四灵与江湖派	278
第一节	晚唐诗风复兴的原因与趋势	279
第二节	永嘉四灵的清冷趣味	285
第三节	江湖诗派的平民意识	290



上 编



本 体 论

第一章 时代风会中的文化性格重铸

宋朝建立以后,统治者总结了唐及五代灭亡的教训,认为前代之亡,在于国家专制力量不够,武人跋扈、地方割据是促使前代王朝削弱以至灭亡的主要原因。因此,宋统治者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以“佑文抑武”为国策。这一基本国策在宋代贯穿始终,既作为宋代政治建设之核心,也构成宋代文化繁荣发展的原动力。一方面,统治者为笼络知识分子,广开科举,大倡尊孔读经,使儒学复兴成为宋代文化繁荣发展的核心体现与重要标志;另一方面,为适应加强思想统治的需要,宋代文人对儒家经典亦力图作出符合集权统治的政治需要的解释。正是在这样的双向作用下,宋人建构了作为新儒学形态的宋学,以一种新的文化内涵和结构渗透于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从这样的时代文化背景上看,宋诗一变唐音,另辟蹊径,也正是时代意识在诗歌史

发展中的充分体现与必然结果。可以认为,正是在时代性的崇文风气与儒学复兴的大背景上形成的浓郁的人文文化氛围与深刻的理性思辨精神,浸透了宋代文人的心理,铸就了宋诗根本的文化性格。

第一节 宋代的崇文风气

宋朝的建立,一方面结束了残唐五代的割据纷争,形成“一轮顷刻上天衢,逐退群星与残月”(赵匡胤《咏初日》)的一统局面;另一方面统治者采取了发展生产的有力措施,使兵乱田荒逐渐变为“稻穗登场谷满车,家家鸡犬更桑麻”(滕白《观稻》)的繁荣景象,即使在“靖康之变”以后,偏安江南的南宋也仍然是经济繁荣的半壁江山。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宋代文化得到极大的发展,形成与前代完全不同的独特风貌。

当然,宋代文化的高度繁荣,更与宋统治者的重文政策乃至社会性的崇文时风密切相关。在宋代,上至帝王,下至民间,皆普遍尚文。如“太宗当天下无事,留意艺文”(《石林燕语》卷八),“真宗皇帝听断之暇,唯务观书”,“仁宗皇帝当持盈守成之世,尤以斯文为集,每进士闻喜宴,必以诗赐之”(《庚溪诗话》卷上)。文士大多“喜为诗,至于图书、博弈、音律无不洞晓”(《宋史·丁谓传》),互相之间更是“闻说优游多唱和,新诗何惜尽看传”(欧阳修《借观五老诗次韵为谢》)。甚至村野农家也是“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晁冲之《夜行》),“昨日邻翁乞新火,晓窗分与读书灯”(魏野《清明》)。可见朝野上下,互为影响,重文已蔚为一代之风尚,而由其“必以诗”、“多唱和”,又可见在这一尚文时风中,诗尤其得到充分的重视和长足的发展,这也是宋诗得以在唐诗之后进一步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和基础。

随着政权建设与治理国家的需要,宋代崇文的内涵亦逐渐由艺文向儒学移转。如宋太宗的佑文政策显见偏重艺文的特点,据《宋史·文苑传》载,夏侯嘉正“端拱初,太宗知其名,召试辞赋,擢为右正言,直史馆兼直秘阁,赐绯衣”,梁周翰“辞学为流辈所许”,“会太宗亲试贡士,周翰为考官,面赐金紫,因语宰相,称其有文,寻迁起居舍人”。诸如此类文士因诗赋出众或才思敏捷而受到恩赏的记载实不胜枚举。太宗本人亦于朝政之余,游心翰墨,雅好吟咏,每逢庆赏、宴会,更是宣示御制,令侍臣赓和。宋初文学创作的活跃,很大程度上体现于唱和诗风的空前盛行,显然与此密切相关。这一倾向到真宗时即出现重要的变化。真宗之重文,更多地强调“勤学”求理,如咸平四年诏赐诸州县学校“九经”,景德三年诏天下诸郡咸修先圣之庙,又诏庙中起讲堂,聚学徒,择儒雅可为人师者以教,一时州县纷纷修庙尊孔,于是经学之士亦随之替代了艺文之士而受到推重。真宗本人尤雅好谈经,曾设置经筵讲研《易经》、《春秋》,并置讲读之职,对专经博学之士多有赏赐之举,在日常诏令言行中更是将儒家经义作为最高标准,被大臣称为“每奉请问,语及儒教,未尝不以六经为首,尔来文风丕变,实由陛下化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五)。可见,儒学复兴潮流至此已经呼之欲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儒家经义为本的观念的确立,改变了诗文创作的思想内涵与风格走向。比如真宗咸平年间,张知白上书议科举之弊,认为“有司之取者,诗赋策论也,故就试者取其题之不晓,词之不明,惟恐其学之不博,记之不广,是故五常、六艺之意不遑探讨,其所习泛滥而无着,非徒不得专一,又使害生其中,何其为然”,希望“正儒术”、“清仕源”,明确要求考试命题以经典正史为据,考试内容须宗经沿圣、为文求本;景德年间,戚纶亦上言“近年进士多务浅薄,不敦实学”,“请诚励专习经史”。对此,真宗即明诏“策

问宜用经史”,并指出:“违经旨以立说,此所谓非圣人者无法也,俟有太甚者,当黜以为戒。”(《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六)这种通过科举为中介的崇文内涵的变化,显然促使文人将主要精力转向儒家经史典籍,直接造成文风在词采富赡、故实奥博的基础上进而充实以经史理致,呈现归宗典则雅正的新趋向。真宗本人的文学创作也一反太宗多有宴赏唱酬之作,于“听政之暇,唯务观书,每观毕一书,即有篇咏,使近臣赓和,故有御制《看尚书诗》三章、《看春秋》三章、《看周礼》三章、《看毛诗》三章……《读五代汉史》二首、《读五代周史》二首”(《青箱杂记》卷三)。大量写作读经观史之诗,其具体内容皆不外圣贤制作、经典义理、历史得失的思考与评论,这些作品对于当时文坛风气的转变,显然具有重要的表率意义。

就统治者的立场而言,真宗对儒学经史典籍的倡导,对靡艳文风的诫飭,自然是出于重整社会秩序赖以规范运行的封建伦理纲常,从而强化封建集权统治的政治需要的目的,但在思想意识领域之内,这些措施恰与当时在文坛尚不成气候的以柳开、石介等人为代表的早期复古派重道轻文观念完全一致。如真宗于大中祥符二年颁发《诫约属辞浮艳令欲雕印文集转运使选文士看详诏》,其所直接针对的是杨亿等人的“西昆”酬唱语涉宫廷秘事,但却同时对整个文坛风气具有诫飭作用。其中明确提出“修词”、“聚学”应以经义为本,认为“辞涉浮华”、“学攻异端”皆“玷于名教”,须加诫飭。而石介所作《怪说》将杨、刘等西昆诸公时文与释老一同归为异端,大倡以儒为本思想,与真宗诏书显然略无二致,正是因此,石介曾作《祥符诏书记》对真宗祥符诏书极加推重。可见,宋代重文内涵的新变,正与宋代思想史、文化史同一走向。也正因此,出现于北宋中叶的以儒学复兴思潮为文化背景与精神内核的文学复古运动才得以形成空前的规模,并改